

---

# 第 1 部

---

## 现代中国学原论



在所有的科学研究中，都存在着试图通过方法论将研究对象的现状向好的方向转化的目的。中国研究也不例外。但是作为本国研究的中国人的中国研究与外国人作为外国研究进行的中国研究，在目的论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人在进行研究时，力图变革本国现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外国研究者如果尝试改革中国的现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不仅仅是主体、客体的问题，也是假说、实证过程的问题，作为科学更有“认识的客观性”的问题。比如，“东方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其在方法论上没有自觉地对目的论（研究目的）加以认识有关。本文以探讨方法论的问题为中心，通过介绍已在医学领域得到实践的“知情—同意”原则，论述树立信息公开、责任说明和对话这三个方法论原则的重要性。

**关键词** 地区研究、目的论与因果论、科学认识的价值中立性、东方主义、OAD

### 序言

战后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对中国的错误认识。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大量的对中国全面肯定或者是全面礼赞性的研究。

文革礼赞式的研究过度美化当时中国的现状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思想，而没有正确地向日本国内传递文革时中国的惨状。而文革的真实情况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日趋明朗，特别是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全面否定了文革之后，就更不容置疑了。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此后研究现代中国的日本学者和专家都无一例外地强调正确、客观地认识现代中国的现状以及预测将来的困难性，而如何尽量克服脱离现实的错误认识和预测就成为研究方法

论的出发点。<sup>1</sup>在此笔者特别想强调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段时期，中国的信息公开无论在量还是在质上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其结果就是文革后日本的中国研究过度强调获得“内部消息”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共产党的“内部”机密文件通过学者传播到“外部”的情况层出不穷，甚至因此出现了纠纷和矛盾。<sup>2</sup>

80年代后期，尽管中国的信息公开取得了长足进步，但重视内部消息的倾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因此它的信息公开仍然是国家权力按照其政治意图进行操纵的产物。就是说，不利于国家权力统治正当化的信息情报仍然受到极力压制，被公开了的信息也带有政治偏向性，自然也就（仍然）重视获取“内部消息”了。

但实际上不管是能否正确认识中国的现实与将来，还是能否通过中国政府机关干部中的“消息灵

通人士”获得“内部消息”，仅仅靠这些作为研究方法论的出发点，只能说日本的外国研究和现代中国研究的方法论是何等贫瘠了。

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如果脱离了“以何种目的将特定的社会和人群作为研究对象”的所谓目的论，本来就不可能成立。以日本经济和日本政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在解析日本的经济、政治体系和构造的同时，一般也必定带有以下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解析对如何更加有效地实施体系结构改革的问题进行预测和政策建议。

以构筑了战后日本政治学基础的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例，战后立即得以出版的其代表作《超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心理》的研究目的和写作意图，正是要通过明确分析战前日本的天皇制超国家主义的根源，来揭示战后日本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的前进方向。<sup>3</sup>在这本书里，当然包含着丸山否定战前日本的政治体制、视其为坏体制的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上的判断。尽管对丸山政治学的评价众说纷纭，<sup>4</sup>但有一点不言而喻，社会科学的目的论就是要对研究对象的社会体系和构造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析。

因此，决不能说带有目的以及支持这种目的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在科学上就缺乏“客观性”。科学上的“客观性”是指什么，是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笔者将在后文中加以论述。

一般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研究因其更追求原理性和高度的抽象性，所以看起来并不包含现实性的目的论以及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但是，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普遍蕴藏着有意识地将发现的经济和政治原理运用于现实经济政策或者政治运营、行政政策之中的目的，可见，包含批评现状性质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是很正常的。

将经济学提升到现代科学的层次，打破了新古典派经济学的巢臼、并被誉为经济学理论革命的“一般均衡理论”的缔造者J·M·凯恩斯，其《雇佣、利息及货币的一般理论》（1936年出版）中就包含了旨在摆脱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恐慌导致的资本

主义经济体制危机的目的，正因为如此，该书出版一年后的193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即以其为蓝本推行新政，成功地振兴了美国经济。

作为社会科学一个领域的现代中国研究，在这一点上当然也不例外，包含着目的论以及支持它的价值判断（以下简称目的性价值判断）或者意识形态。但如前所述，大部分中国研究者却没有自觉认识到有必要将这种目的性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引入科学的方法论，仍然拘泥于仅去确保“认识的客观性”。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也处于没有自觉认识的状态，都抱定一个前提，就是只要在研究中混入了目的性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就一定会损害“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在这个前提下，人们逐渐产生了一种倾向，就是把方法论的焦点对焦于如何在科学研究中排除目的性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这一点上了。

这种情况之产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现在被认为是错误的、被完全否定的文革时期的中国研究中包含了强烈的目的性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并且这种认识决定性地缺乏“客观性”。实际上，如后所述，文革时期的中国研究极度缺乏“客观性”的理由并不在于目的性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但是文革以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成见，就是中国研究存在的目的性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损害了“认识的客观性”。今天，中国研究的主流方法论仍然偏向于观察学（watching）正是这种成见的后果。

因此，在中国研究的学术领域里，人们忽略了科学研究不可能脱离目的性价值判断这个现实，根本就没有尝试去探讨如何将目的性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与“认识的客观性”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问题。以下笔者将首先探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论。